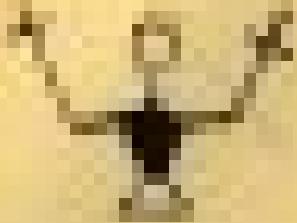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周祥森

河南大学出版社



生命的藝術與設計的美學

周易

K0-53/7

2007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周祥森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周祥森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4

(中国学术批评书系)

ISBN 978-7-81091-540-3

I. 史… II. 周…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841 号

责任编辑 陈广胜

封面设计 张 胜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77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眼前的这部书稿是青年学者周祥森的史学评论论文集。在当今史学界，愿意写史学评论的人不多，献身于此并在这个园地中不懈耕耘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所以，我很想为他的文集出版说几句话。这是对祥森的责任，也是对学界的期望。

大概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史学界就有人开始呼吁要建立、发展史学评论学科。有人写文章论述史学评论的学科体系，对之进行理论的研究，也有人从事具体的评论工作，有不少分量颇重的书评佳作发表，但是，说实话，就一个学科的建立来说，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却是远远不够的。专业的评论人员几乎没有，史学评论文章之少与史学研究成果的大批出版也是那样的不成比例；史学评论的发展，它所取得的成绩，无论对于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来说，还是相对于其他学科如文学评论来说，都是那样的薄弱而不值一提。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呢？是不屑于和他人对话而表现出的一种冷漠态度？是从内心和骨子里对这种学术工作的鄙夷或无视？是中国人情社会对评论实践的围剿或扼杀？还是我们从理性上就没有认识到这样一门学科的必需或重要？总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史学评论学科的发展就是那样的艰难和无助。它所达到的，远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状况。

关于史学评论发展之艰难，我是深有体会的。1996 年 11 月，我到《史学月刊》编辑部工作，提出发展史学评论的构想，开辟了专门的“史学评论”专栏。按我们的设想，要发表关于历史图书评论、史学研究状况评论、史家个人评论、史学思潮评论和史学评论的理论研究等多方面的论文，希望通过健康的、积极的、研讨性的史学评论，推动历史科学的研究的健康发展。为着这个崇高的目的，我们四处约稿，但最后的结果是那样地令人失望：一方面是找作者难，评论的作者需要是站在学术前沿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适合

2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评论的学者又大都不愿接受这样的选题,说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使。中国这个典型的人情社会,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争鸣都很难开展,更遑论指名道姓的评论!所以,尽管我们的“史学评论”栏目开设已有10年,但发表的令人满意的作品却不多,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而祥森则是在这样一个出力不讨好的领域,不懈耕耘了十多年之久,仅此一点,就令人折服。1994年,他的第一篇评论《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在《史学月刊》发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被《新华文摘》长篇转载之后,更是获得了好评如潮的效果。之后,他就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史学评论的理论研究与相关的史学评论实践,甚至放弃了他所学的美国史专业。

在国内史学界史学评论所以不被重视,除了人情的原因、功利的原因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人们总认为评论文章的科研含量、研究深度,均不及一般的学术研究性论文,所以不屑为之。其实,这是一个顽固的偏见。没有做过评论的人,是无法理解写评论文章的困难与辛苦的。譬如评论一本学术著作,首先要求评论者真正能处于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而且最好是评论者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研究或思考;其次,评论者要把所评论的著作读深读透,反复咀嚼,对评论的对象有完整而深入的把握,以保证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并且评论者还要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评论对象的研究结论、理论观点、研究方法、材料运用等方面都能有所评点,分析其在学术研究基本方面的建树或缺陷;最后,评论者还要有前瞻性的眼光,能指出所评论的著作对学术发展的大势有何助益。要做到这些方面,评论者需要做多么艰辛的研究工作,需要有多么深厚的理论储备!

就拿祥森在《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发表的《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一文来说吧,这是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写出来的。我目睹了他整个的写作过程。为了写这篇评论,他几乎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著作,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之外,50卷本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都翻过来了,思考了与之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每有新的想法,他就和我一起讨论,有时在电话上一谈就是一个小时。通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他发现了

他的评论对象蒋大椿先生和蒋大椿的批评者们在思想方法上的显著差异：蒋大椿先生是将自己的思考回到了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思维原点——现实社会，而蒋大椿先生的批评者们全部用心都在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虽然，回归或反观文本自身做法也有它的意义或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源泉毕竟是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实践。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课题，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无比丰富而伟大的现实社会实践出发，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思维路线，当然也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后果。前者容易走向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萎缩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而后者则可能因为回应现实社会实践的变化或发展，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生命活力。一旦找到了批评与被批评双方在思想方法上的重大差异，评论的主题就跃然纸上了。至今，我还可以回忆起在找到了这个评论的中心之后他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激动和兴奋。当祥森把文章的标题确定为“客观世界和文本世界的交锋”而告诉我的时候，我几乎是拍案叫绝，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题目，也可以说是个经典性的题目。后来记不清是什么原因，在文章发表前夕，祥森突然告诉我想换个题目，我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否定了他的意见，说“客观世界和文本世界的交锋”是最恰当、最贴切，也最能给人以启发的题目，是你的文章的灵魂所在，不要换了，单是这个题目本身就一定会在学术界产生影响。他接受了我的意见。文章发表之后，在我所接触到的史学界的朋友中，没有不给予称赞的。他的思想深度，他的写作思路，以及他那犀利的文笔，获得了普遍好评。

我举这个例子，一是说写作史学评论文章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甚至比自己独立研究一个专业学术问题还要煞费精力；同时，它也反映出祥森的治学态度和精神。他是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他所评论的对象的，的确是把史学评论当做学术研究去做的。祥森评论过不少著作，却从没有一篇是像时下某些评论那样名为评论实则广告的作品。不虚美，不掩恶，他是想通过评论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一点借鉴或参考。他的评论不是为评论对象而作，而是为着学术的事业，学术的发展。

祥森治学，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他特别重视学术规范问题，这在时下的学者群体中是比较突出的。他尽管是写评论文章，但在遇到借鉴或参考了别人的地方，都一一详细注明；甚至是在和别人谈话中得到的启

发，他也要明确地标注出来。这一点，凡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有同感。

祥森在“后记”中用了很大篇幅来谈和我的思想关系，这使我很觉不安。我当面和他谈过，说我对他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他也使我认识了他所具有一种一般年轻人所没有的思维品质，那就是他总能非常清晰地描述出自己思想发展的脉络和思想成长的历程。我以前是做史学理论的，教学中也总是要求学生要不断地总结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不断地梳理自己的思想，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这是培养思维方式的一个极好的途径，而这种要求几乎没有哪几个学生可以做到。在祥森身上，我看出了这种思维品质。我以为，这是一个人很可宝贵的品质，特别是一个思想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当然，祥森还年轻，他没有成熟到国人那种世故圆滑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文集中看到，他很直率，无论是面对专家权威，还是涉及名报大刊，他都无所顾忌，观点总是那样旗帜鲜明，文字总是那样犀利逼人，可能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我希望看到这些文字的人能够原谅他，能够有所宽容。据我所知，他没有一个敌人，他没有对任何人怀抱偏见。他所说的话，他的评论文字，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尽管说得不一定妥当，但却从没有恶意。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总是有人习惯于把青年人的某些做法或思想叫做“不成熟”，这似乎是在为年轻人解脱，表现了一种宽容；但我觉得，将年轻人的锐气看做是不成熟的表现，只是对他们的轻蔑和无视。像祥森的无所顾忌，其实只是率直和真诚。我希望祥森保持自己的真诚，不要去追求那种所谓的“成熟”。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活力，需要讨论和争鸣，需要真诚而无所畏惧的批评，因此，中国的史学评论界也需要多一点率直和真诚。

一篇小序拉拉杂杂说了这许多，应该打住了。其实，一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它的贡献、意义或价值，是应该留给读者去评判的。我们所需要表达的，只是对作者未来的祝福。我相信，祥森会把文集的出版作为自己一段旅程的小结，而未来的旅途还更远，更值得憧憬。我们期待着他为学界奉献更多的评论佳作，也期待更多年轻的史学评论学者成长起来。是为盼！

李振宏 谨识

2006年10月28日

目 录

序	李振宏(1)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1)
历史学是什么?	(9)
探询克丽奥之谜	
——爱德华·H. 卡尔《历史是什么?》解读	(27)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	
——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	(57)
“反思”的反思	
——评《论历史感与历史学》	(98)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的宗旨	
——兼评雷戈的历史观	(114)
“糊涂论”传记观异议	(128)
对“陈寅恪热”现象的反思	(135)
杜绝历史科学中的“三化”文风	(142)
当前中国历史学家的要务	(146)
21 世纪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若干趋势	(158)
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164)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困境	(168)
“实践的思维”、史学观念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173)

新史学:历史学家的永恒追求 (179)

中国古代史学评论概念的演变 (200)

先秦时期口头史学评论形态 (208)

历史著作形式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史学评论思想研究札记 (216)

学术著作评论的价值标准 (231)

史学评论界“裁花”风盛行的原因 (244)

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分析 (272)

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科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 (292)

评《美国历史散论》

——兼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 (305)

评《中国人的美国观》 (317)

关于北美殖民地时代的两个问题

——读《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 (330)

大变革时期史学期刊的任务与作用 (336)

《史学月刊》与1949年以来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 (340)

我与史学评论(代后记) (360)

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

历史科学可以区分为实证的经验历史科学和理论历史科学,它们既是历史科学两个层次不同的组成部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和考察方式,又是历史科学本身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和环节。史学评论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其本身也可以区分为经验史学评论和理论史学评论两个层次不同的领域和实际发展阶段。经验史学评论,我把它理解为“史学的批评”;而理论史学评论,我把它看做是“批评的史学”。

我对历史科学的这种区分和认识,主要是受黑格尔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的启发。

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3部分《精神哲学》中谈到心理学时,把“精神科学”之前的心理学(又称“灵魂学”)区分为“作为抽象的知性形而上学”的、以“思辨的考察”为认识的主要基础的“理性心理学”和“以具体的精神为其对象”、并在“科学复兴”以来以观察和经验为认识的主要基础的“经验心理学”。经验心理学“意在观察和描述各种特殊精神能力”。理性心理学“只研究抽象的普遍规定,只研究臆想的无现象的本质,及精神的自身”,而且“用单纯的知性范畴来规定对象”,把精神看做是一个物,一个静止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无论是经验心理学,还是理性心理学,都“把对象作为被给予的从表象那里来接受”,都“没有达到个别东西和普遍东西的真正联结,没有达到认识精神的具体普遍的本性或概念,因而同样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真正思辨哲学的称号”。由于经验心理学、理性心理学都存在着思想方法上的严重缺陷和研究对象上的明显局限,因此黑格尔提出了作为“真正思辨哲学”的心理学,即“精神科学”。根据真正思辨哲学的精神科学,精神,从本性上来讲,

“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宁可是绝对不静止的东西、纯粹的活动、一切不变的知性规定的否定或观念性；不是抽象单纯的，而是在其单纯性中自己与自己本身相区别的活动；不是一个在其显现以前就已经完成了的、躲藏在重重现象之后的本质，而是只有通过其必然自我显示的种种确定的形态才是真正现实的，而且不是（如理性心理学臆想的那样）一个只与身体处于外在联系中的灵魂物，而是由于概念的统一性而与身体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作为真正思辨哲学的精神科学，“把精神理解为知着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和“在自己本身内区别着和从其区别向与自己的统一回复着的活生生的精神的概念”，因而它“不仅仅克服了有限的精神观里占支配的单纯个别、单纯特殊、单纯普遍的抽象概念并将它们降低成为作为它们的真理的概念的诸环节，而且还极力主张不是对发现的材料作外在的描述，而是按必然性自己发展着的内容的严密形式才是惟一科学的方法。如果说在各门经验科学中，材料作为通过经验给予的东西是从外面接受来的，同时是按照一个已经确定不移的普遍原则来予以整理并使之有了外在的联系的；那么与此相反，思辨的思维则必须在诸对象的绝对必然性中来阐明自己对象中的每一个对象以及这些对象的发展。这件事是借助于从产生着和实现着自己本身的普遍概念或逻辑理念中推导出每一个特殊概念来实现的。因此，哲学必须把精神理解为永恒理念的一种必然的发展，并且必须让那构成精神科学各个特殊部分的东西纯然从精神的概念中自己展开出来”。^[1]在作为“绝对精神”部分的《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2]因此，哲学意义上的、真正思辨的精神科学，就是把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降低成为这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环节，运用真正思辨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式理解”的方式，而非“单纯反思思维的有限考察方式”，也非“单纯推理的考察方式”，采用“惟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法，来研究“活生生的统一”的、而非那僵死的抽象知性范畴的精神的科学。如果仍用“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来表述，那么黑格尔所谓的作为“真正思辨哲学”的“精神科学”，也可以称为理论心理科学，而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则可以相应地称做是经验心理科学的两种表现和包含在经验心理科学里的两种形式，同时它们也是心理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和环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叙述自然研究的发展历程和 19 世纪欧洲自

然科学现状时,则把自然研究区分为经验自然科学研究和理论自然科学研究。从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来看,经验自然科学和理论自然科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的类型,而且也是自然科学的两个层次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发展历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与环节。恩格斯认为,理论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把它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加工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并且总是用思想的彻底性去补救有缺陷的知识”,甚至有时为了使理论自然科学自己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它还必须从哲学那里接过有关原理,例如 19 世纪的理论自然科学不得不“从哲学那里接过运动不灭的原理”,并且需要认识哲学史,特别是“认识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理论自然科学对于经验自然科学具有指导意义。恩格斯说:“现在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寸步难行。”在恩格斯看来,经验科学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其主要任务在于“搜集事实和尽可能有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从而为理论科学“积累……实证的知识材料”;当经验科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确立每一研究领域之间和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成为一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须完成的任务的时候,这门科学就走上了理论的领域,即进入理论科学发展的阶段。恩格斯在谈到经验自然科学向理论自然科学发展时说:从 15 世纪下半叶以来至 19 世纪 70 年代,“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在理论科学的研究中,“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由于黑格尔已经把辩证法从古代尚处于模糊观念的阶段推进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马克思剔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而保存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3]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确立对象之间的正确关系,就是从既有的事实本身中发现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不是设计种种联系从外部塞到事实中去——这样的联系对于事实本身来说只是外在的,因而是随意的、偶然的联系。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4]

根据上述黑格尔、恩格斯的科学观的基本思想,作为经验史学评论科学的“史学的批评”,其基本含义就是对史学的批评(评论)。它的对象是个别的或特殊的、因而是具体的史家主体的史学实践活动及其历史认识成果,它所处理的都只是一些单纯个别的、单纯特殊的、单纯普遍的史学事实,例如,对某一史家个人或其史学研究成果、甚至是对其史学研究成果中非常具体的某一部分历史认识成果的评论,对某一史学流派、史家群体、史学思潮、史学现象的评论,对特定时期、主要是最近一段时期历史科学某一研究领域的状况的评论。不管其中的哪一种史学评论表现方式,它的评论客体都是孤立的、静止的,而且一般不涉及所评论的对象与其他史学评论客体之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探索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经验史学评论所采用的方法,是以经验的史学方法和知性的考察方法为认识的主要基础的。经验的史学方法是指在实证的经验历史科学的研究中所常用的方法,如历史考据法、历史纠谬法、内证法和外证法,等等;知性的考察方法是指知性认识所采用的归纳、演绎、推理等方法。在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中,人们在“挑刺”样式的史学评论中可以经常看到前一种方法的运用,而在“栽花”样式的史学评论中则可以经常看到后一种方法的运用。通常情况下,在经验史学评论实践中,评论主体混同使用两种类型的方法中的某些具体的方法。

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就是要建立起一门“批评的史学”,也即把史学评论从经验领域推进到理论领域,使其从经验科学发展成为理论科学。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除了与人们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及其实际发展过程发生一定的关系外,一般不直接面对具体的经验历史科学的研究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而是直接以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实证的知识材料

为前提和基础。它一方面以这些实证的知识材料为认识中介，并对这些知识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从而认识史学评论本身；另一方面，它接过理论历史科学所提供的有关理论，并且和其他理论科学一样，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唯一科学的认识方式和说明方法，从经验史学评论所提供的既有的事实出发，也即从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表现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阐明史学评论科学的性质、对象、任务、方法、理论基础、社会功能和科学功能等理论问题，研究史学评论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史学评论主体的素养、史学评论客体的构成及其特性，说明史学评论科学与历史科学相关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描述史学评论概念在实践中的实际发展过程，从而发现史学评论本身内在地、必然地发生的各种普遍的联系，揭示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

从本质上讲，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是一种历史科学研究。这不只是因为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本身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而且是因为它的许多课题和任务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历史地发展起来并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的。例如，史学评论的实际发展方式，也即史学评论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环节中，在变化的形态中，在某些政治环境里，或在由政治环境而引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简言之，出现在经验的形式内的各种特殊化的形态，都只能在人们的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中，也即通过对史学评论的现实历史的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史学评论的对象、任务、方法等等，同样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例如，史学评论的任务，在中国封建时代，史学评论并不是为了满足传播历史研究成果和普及历史知识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推动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主要是为了维护以经学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因此在史学评论的根本标准和指导原则上就只能是“宗经矩圣”，史学评论只不过是代圣人立言的一种特殊方式和政治存在方式而已。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是一种历史科学研究，还因为它所直接依赖和处理的知识材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离开了历史上人们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所提供的实证的知识材料，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就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史学评论基本概念的内容的认识，同样必须通过对史学评论历史的考察。史学评论科学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对史学评

论史里面出现的相关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5]之后所得到的史学评论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对于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善于从史学评论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概念自身。

经验史学评论科学和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是辩证统一的。经验史学评论科学是史学评论科学的实践形式，或者说是史学评论科学在历史科学实践活动中存在方式；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是史学评论科学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史学评论实践在人们的思想上、理论上的表现。经验史学评论科学为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提供实证的知识材料，并在实践中验证和修正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成果；理论史学评论科学则为经验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提供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从而尽可能地消除经验史学评论科学的经验性质和僵死的抽象知性性质。理论史学评论在经验史学评论实践里取得其生动的表现和其必然自我显现的、确定的、真正现实的经验形态与外在形式。

在 21 世纪的今天，建立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既有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及其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做基础，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做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应该说条件是比较充分的。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伴随着经验历史学的产生而开始出现、并伴随着经验历史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这过程中，经验史学评论还充当了理论历史学的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作为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的孔子，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历史材料。先秦时期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虽然尚处于自发的、模糊的阶段，而且是零星的、史学不在场的评论，但是这个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经验史学评论的知识材料，对于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建设还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而对于中国古代经验历史学的发展来说，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西汉时期，历史学家开始有了自觉的经验史学评论意识。东汉哲学家王充第一个把包括经验史学评论在内的“论”作为思想的对象来进行认识，区别了“论”与“述”、“作”之间的不同，初步探讨了“论”的对象、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评论标准等理论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

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评论”从政治实践活动被引入到经验史学实践活动之中,“评论”——主要是历史评论,即史论——本身成为了经验史学评论实践的对象,并产生了一批历史评论著作;另一方面,以文学理论的形式,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探讨经验史学评论中的历史评论问题。唐代,诞生了第一部通论性的经验史学评论经典之作,即刘知幾的《史通》。《史通》所研究的只是单纯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问题,史学评论本身并没有真正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它虽然对中国古代理论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从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发展角度来说,与王充和刘勰相比,它却是一个退步。当然,刘知幾曾经提出史家主体评论的“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概念,并对它们做了简要的阐述,而且他在《史通》中是按照这史家“三长”来评论史家的,但综观他的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只是一种经验的史学评论,基本上没有理论史学评论的自觉意识。宋代,“史评”在文献目录学中被认做是史学中的一个独立的领域。清代,经验史学评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批以历史考据和历史评论为方法特征的经验史学评论专著,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同时,也出现了中国古代理论历史学的另一部经典之作——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近代以来,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近代“新史学”就是以批判传统史学而开始自己的革命历程的;而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以批判中国传统的史学,而且以批判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为自己的发展的前提,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

除了历史学家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成果外,历代的学者、文人甚至政治家,也留下了零散但丰富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历史材料。但是,纵观整部中国史学史,理论史学评论始终处于萌芽状态,理论史学评论的自觉意识非常缺乏。除了当代极个别的历史学家(如瞿林东)外,在当代之前,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自觉地对中国史学史上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实证的知识材料进行搜集并尽可能系统地予以整理,自然也就谈不上在这些历史材料所反映的史学评论事实中发现史学评论每一实践活动领域的内在联系,从而确立起史学评论科学每一研究领域之间的正确关系。